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 的文献价值

包 晓 悦

内容摘要:本文对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中的十件(缀合成八种)典籍类写本残片进行了比定和初步分析,其中既有中原传统典籍,也有佛经和道教经典。根据早期收藏者王树枏、梁玉书等人的题跋,这些写本残片多出自吐峪沟佛寺遗址,年代在公元 5 世纪到 10 世纪之间。它们保留了典籍较为原始的面貌,具有一定的文献校勘价值,同时也展示出中原与西域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

关键词:日本书道博物馆 敦煌 吐鲁番 文献

日本书道博物馆是由书画家中村不折建立的一所私人博物馆,其中收藏着他自大正初年到昭和十八年(1943)三十馀年间所收集的一批敦煌吐鲁番文献。这批文献中的部分写本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刊布,包括世俗文书、写经题记、疑伪佛经以及一些回鹘文写本与印本,但其全貌一直未被学界所知。

大约在 1945-1955 年间,中村不折长子中村丙午郎以其父著录的写经目录为基础,编成《经卷文书类目录(中国及本国)附解说》(以下简称“《经卷文书类目录》”),以财团法人书道博物馆名义发行了油印本^①。这份目录在每一件文书之下著录名称、字体、尺寸、行数、年代、出土地、题记,以及对其书法的评论等信息,长期以来都是研究者了解书道博物馆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状况最为全面和重要的资料。此后,荣新江《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敦煌文献纪略》一文,全面搜集和介绍了书道博物馆此前各类文献的刊布情况以及研究价值,并介绍了《经卷文书类目录》,特别指出其中著录的数十卷王树枏与梁玉书(字素文)旧藏写经残卷册,每册之中都贴裱数件文献,大多是此前未经刊布的^②。陈国灿《东访吐鲁番文书纪要(三)》亦参考《经卷文书类目录》,对

①锅岛稻子:《中村不折旧藏写经类收集品》,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2005 年,第 357 页。

②原载《文献》1996 年第 2 期,第 149-158 页。后收入同作者《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74-183 页。

书道博物馆藏确定为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进行编目,分别著录文献名称、行数、尺寸、出土地以及相关研究。目录前三部分分别为经卷写本、民族文字经卷和历史文书卷,之后则依照《经卷文书类目录》著录王树枏旧藏写经残卷册^①。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书道博物馆藏部分也是以这份目录为基础编撰的。

学界对书道博物馆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了解与研究不断深入,但仍有许多不明之处,尤其是原属王树枏、梁玉书旧藏的写经残卷册,基本只能依赖《经卷文书类目录》的简单著录。2000年书道博物馆作为归属东京市台东区的公立博物馆重新开馆,此后由东北大学矶部彰先生主持,整理出版了图录《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以下简称“《中村集成》”)^②,依照《经卷文书类目录》的顺序将书道博物馆所藏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影印出来,使我们得以见到这批文献完整清晰的彩色图版,实在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经过与《中村集成》图录的对比,我们发现《经卷文书类目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经卷文书类目录》没有著录书道博物馆所藏全部敦煌吐鲁番文献。如今编号 SH.145 至 SH.151 的文献就不见于《经卷文书类目录》,其中 SH.148《吐鲁番出土唐人墨迹·十五》中四件文书由于收入金祖同《流沙遗珍》,早为学界所知,但 SH.147《唐人写经残卷·六》与 SH.151《至元通行宝钞册》均出吐鲁番,此前就不见著录。

其次,《经卷文书类目录》著录信息有一些错误。最明显的是部分原为梁玉书旧藏的文献被错误地著录为王树枏旧藏,如现编号 SH.162《北魏写经残卷(十六)》、SH.166《六朝以来写经残卷(廿)》,封面均有“素文珍藏”或“素文先生珍藏”题签^③,但可能由于卷首有王树枏跋,被误作为王树枏旧藏。

最后,原属王树枏和梁玉书旧藏的写经残卷册每件之中都贴裱数件到数百件不等的残断写经或文书。其中现编号 SH.152 至 SH.173 的写经残卷册由于贴裱的文书或写经尺寸相对较大,《经卷文书类目录》还著录其中每一片的名称、字体、尺寸等信息,但著录较为简略,许多佛经写本由于残断不见经名,名称就只著录为“残经”。而现编号 SH.174《北凉写经残字册》(一至五册)、SH.175《唐写经残片册》(一至三册)、SH.176《流沙碎金册》这九部残片册实际包含了八百余片文献残片,但由于数量大,又多为小残片,《经卷文书类目

①收入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3-166页。

②参棍晋晋书评,载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14-417页。

③《中村集成》没有收录写经残卷与残片册封面图片,题签见锅岛稻子《中村不折旧藏写经类收集品》一文中录文。

录》仅著录每册写本残片总数,并对某些重要写本略作提示,其中每一件写本残片的具体信息我们都不得而知。

如今图录既已问世,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部分文献重新进行编目^①。通过这一工作,我们发现,这批文献虽然大多是残简断章,其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却不可小觑,以下仅就笔者所见,对其中较为重要的十件(缀合为八种)中原传统典籍和佛教、道教文献略作提要和介绍。

一、中原传统典籍

1. SH.174-1-47+SH.174-1-48《汉纪·孝武皇帝纪》

写本裂为两片,均裱于《北凉写经残字册·一》叶一二^②,可上下缀合,缀合后存5行,其中第一行与最后一行残字笔画缺损严重,难以辨认,《中村集成》未定名。册子末有王树枏题跋:“此残字册亦出鄯善土峪沟,星桥中丞得之,悉以遗余。”^③“星桥中丞”即联魁,字星桥,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二年(1910)间任新疆巡抚^④,据此,则本件写本出自吐峪沟。首先录文如下:



- 1.]□[
- 2.]□轮台之[
- 3.]□西域,近有垒堆,远则葱岭,□[
- 4.]欲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
- 5.]□□[

这段文字见于《汉书·西域传》末所附的“赞”,是班固对汉武帝西域政策的评论。《汉书·西域传》称:

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书》曰:“西戎即序。”禹即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贡物也。^⑤

通过比对写本残片与《汉书》相关段落,我们发现有两处不同,一是残片“葱

①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新标目》,《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②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95页。

③转引自朱玉麒:《王树枏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吐鲁番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69-98页。

④参朱玉麒:《王树枏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第73页。

⑤班固:《汉书》卷九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395页。

领”，《汉书》作“葱岭”，按“领”、“岭”本互通，在文义上没有区别，可能只是传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二是残片“垄堆”，《汉书》作“龙堆”，按“龙堆”特指位于罗布泊东北的白龙堆，此处地乏水草，环境复杂，商旅行客极易在其中迷失方向，但却是汉代中原经楼兰前往西域的必经之处，历来被视作往来中原与西域的一大阻遏，而“垄堆”意为隆起的高丘，并非专有地名，这一差异到底是传抄中产生的讹误，还是写本内容另有所本呢？

《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称：“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荀悦以编年体作《汉纪》，将《汉书·西域传》这段文字引入了《汉纪》卷一五《孝武皇帝纪》中，并有所删改：

民力屈，财货竭，因之以凶年，群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衣、持斧钺，斩断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圣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阨，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分别区域，隔绝内外也。

《书》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无以致其贡物也。^①着重号标记的是《汉书》与《汉纪》互异的文字，其中绝大多数异文在残片中都没有保留下来，给我们判断残片文字内容造成一定困难。唯有“垄堆”二字，《汉纪》今点校本作“龙堆”，但其底本，即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黄姬水刊本却作“陇堆”，此本以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王铨刻本为底本，而王铨则是以大中祥符间钱塘本为底本，“用诸家传本校其异同，拨其讹误，稍条然可读，遂再刻之”^②。目前宋刻《汉纪》已不存于世，黄姬水本虽在翻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新的讹误^③，但毕竟是与南宋刻本最为接近的版本。此外，还有一个年代早于黄姬水本的《汉纪》明刻本，即正德十六年（1521）何景明、翟清据吴地某家所藏抄本刊刻，并经吕柟校正的本子，此处亦作“陇堆”^④，足可证明此处非黄姬水本讹误，宋刻《汉纪》也应当作“陇堆”。

如今我们更是得到早期写本的证据支持，“垄”、“陇”二字互通，“陇堆”即“垄堆”，本件写本残片年代在公元5世纪前后，说明很可能《汉纪》原文即作“垄堆”而非“龙堆”，因此这件残片也应当比定为《汉纪·孝武皇帝纪》。明清以来各家重刻《两汉纪》以黄本为底本，多据《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等校正，故此一句多改作“龙堆”，反倒失了原貌。李焘曾批评宋人“间用班固

①荀悦：《汉纪》卷一五，《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第226-227页。

②《两汉纪》，第597页。

③翟鏞《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载其藏有《汉纪》三十卷影钞宋本：“末有‘右通直郎时添差充绍兴府会稽县丞庄革校正’一行。每半叶十三行，行廿四字，当是从绍兴间钱唐刻本影写者。案此书符祥天圣中皆有刊本，昔人每谓不若绍兴本之善，明黄姬水亦得宋本以刊。相较则此本为胜。”后列举五条黄姬水刊本讹误。

④荀悦：《汉纪》卷一五，明正德十六年何景明、翟清刻本，叶八。

书窜改悦语”,认为“悦为此纪固不出班书,然亦时有所删润”^①,是对两书区别有所认识。虽然就以上讨论的例子而言,“龙堆”改作“垄堆”未必合理,但我们也不宜轻改原文。

除本件写本以外,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汉书》及《前汉纪》写本至少还有三件。第一件是1980-1981年吐鲁番文物局对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进行清理时发现的《前汉纪·孝武皇帝纪》^②,写本年代或为东晋^③。第二件是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写本《汉纪·孝成皇帝纪》^④,从字体形制看当为唐抄本。第三件是一件正面抄写《汉书》背面抄写《史记》的写本,年代在唐前期,或出自吐鲁番,或出自库车^⑤。本件写本字体与柏孜克里克出土抄本相近,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抄写年代或许稍晚于东晋。随着北凉沮渠氏自河西入据高昌,大批河西土族与高僧进入该地,他们必定也同时带来大量佛经与儒家经史典籍,目前吐鲁番发现的前高昌国时代的典籍写本应当就有部分来源于此。

二、佛教典籍

2. SH.174-2-95《大乘二十二问本》

存9行,前后及上部残缺,裱于《六朝写经残字册·二》叶一九^⑥,《中村集成》未定名。该册封面有题签:“六朝写经残字出鄯善土峪沟仲父珍藏”^⑦,“仲父”即王树枏,是为王树枏旧藏。

首先录文如下:

- 1.]云不退[
- 2.]如法性无动念[

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1页。

②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报》最初定名为《汉书·西域传》(《文物》1985年第8期,第54-55页),柳洪亮沿袭之(《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始定名为“晋写本东汉荀悦撰《前汉纪·前汉孝武皇帝纪》”(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30页)。

③余欣:《写本时代知识社会史研究——以出土文献所见〈汉书〉之传播与影响为例》,《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后收入同作者《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6页。

④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编:《旅顺博物馆藏トルファン出土汉文仏典断片選影》,法藏馆,2006年,第174页。参荣新江书评,季羨林、饶宗颐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第409-413页。

⑤荣新江:《〈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41-43页。

⑥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103页。

⑦锅岛稻子:《中村不折旧藏写经类收集品》,第359页。

- 3.]解故分证真如
- 4.]乘亦能权现化作佛
- 5.]此功德能故此菩萨名
- 6.]开导群生拔济含识由证真如
- 7.]运纯无相心在法驶
- 8.]随起化地不动无相内虽
- 9.]此位菩萨名行[

我们比定此残片为《大乘二十二问》抄本。该书是长安西明寺学僧昙旷晚年（约786年后）在敦煌所写，是对吐蕃赤松德赞赞普询问佛教教理时所做的书面回答^①，敦煌已发现多件写本和摘抄本，上山大峻据当时可见的九件写本互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本子。《大乘二十二问》写本在吐鲁番发现尚属首次。

《大乘二十二问》从敦煌流入西州的时间当在9到10世纪。8世纪末至9世纪初，回鹘、吐蕃和唐朝三方势力在以西州、伊州为中心的东部天山地区颇进行了一番较量^②，公元803年之后，西州基本由回鹘人控制。回鹘人原本奉摩尼教为国教，在9世纪西迁进入天山东部地区，尤其在866年建都于此，他们受到此地浓郁佛教文化的长期浸染，逐渐皈依佛教。而吐蕃在786年占领敦煌之后，大力扶植佛教发展，使得敦煌成为河西佛教的中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敦煌在佛教上的中心辐射作用日益显现，尤其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双方多次互派使者，其中有些使者就是僧人；同时有大量佛典从敦煌流入高昌^③。本件抄本有一些文字错讹，第5行“功”下衍“德”字，第7行“运”下阙“住”字，且第6行明显是漏抄之后在两行空隙之内补抄的文字，另外书法也较为粗陋。唐朝势力逐渐退出西域及河西之后，中原文化在这一地区也有所衰落，反映在汉文写本上的特征就是用纸粗劣，书法稚拙潦草，本件写本就明显体现出这一时代风格。

这件写本是在敦煌抄写继而携至高昌，还是据流入高昌的《大乘二十二问》其他写本所抄，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它表明昙旷的著作不仅在敦煌具有相当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的吐鲁番地区，同时也显示九到十世纪敦煌佛教对高昌的深远影响。

①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第32-33页。

②森安孝夫：《增补：ウイグルと吐蕃の北庭争夺战及びその後の西域情势について》，流沙海西奖学会编：《亚细亚文化史论丛》第3卷，东京，1979年，第227-231页。陈国灿：《八、九世纪间西州统治权的转移》，《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6-496页。荣新江：《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8-171页。

③荣新江：《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第583-604页。

3. SH.174-5-22《法王经》

本件残片裱于《北凉写经残纸册·五》叶五^①，《中村集成》未定名。册子末页有王树相题跋：“宣统纪元，湘乡刘宝臣谟署理鄯善，其所属土峪沟土山之上，佛寺最多，仅存遗址。土人掘得残经数种，宝臣驰驿寄余。”^②这一册佛经残片应当是 1910 年前后吐鲁番乡民从吐峪沟古佛寺遗址的沙土之中掘得的。

残片存 3 行，录文如下：

1.]跃□[
2.]名正问是□[
3.]生菩萨[

经比定，这件残片抄写的是《法王经》，这是一部中国僧人所造的伪经，写成年代约在华严宗与北宗禅盛行的武周时期，《武周刊定众经目录》将其置入伪经目录^③，此后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敦煌文献中有此经汉文写本六件及藏文写本两件，后吉田丰又比定出伯希和敦煌所获粟特文写本 PelliotSogdien 23 是《法王经》的粟特语译本^④。残片内容为以下经文的一部分：

尔时大众一切众生皆大欢喜踊跃。佛言：“菩萨为诸众生所作如是问是名正问，是度众生。若作他问是名邪问，是灭众生。菩萨汝能正问是度众生。汝等众生皆当一心专念谛听，除散乱想无营物外坐性坚志。”

荣新江先生在《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一文中指出：“中唐以后，中原地区禅宗得到广泛流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唐朝政治势力虽然逐渐退出西域，但禅宗典籍和思想却流传开来，并影响深远。”^⑤在这一过程中，《法王经》这一禅宗伪经也传到吐鲁番地区，经吉田丰比定，大谷文书 2326、2922、2437 三件残片缀合后也是一件《法王经》粟特语译本^⑥。如今发现的这件出自吐鲁番的汉文《法王经》抄本提示我们，吐鲁番《法王经》粟特译本未必一定是由粟特佛教徒从敦煌携带而来，也可能就是在吐鲁番当地完成翻译的。

4. SH.176-97《治禅病秘要法》卷一

本件残片裱于《流沙碎金册》叶一八^⑦，《中村集成》未定名。《经卷文书类目录》题作“新疆出土”，但同册 SH.176-94《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写〈金光明最胜王经〉题记》与出自敦煌藏经洞的 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卷末

① 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 110 页。

② 转引自朱玉麒：《王树相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第 69-98 页。

③ 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 113 页。

④ 吉田丰：《ソグド语佛典解说》，《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VII，1991 年，第 111 页。

⑤ 荣新江：《唐代禅宗的西域流传》，《田中良昭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禅学研究的诸相》，东京大东出版社，2003 年，第 59-68 页。

⑥ 《オリエント》第 28 卷第 1 号，1985 年，第 50-54 页。又见百济康义等编：《イラン语断片集成·解说编》，法藏馆，1997 年，第 72-73 页；同书《图版编》，第 15 页。

⑦ 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 128 页。

题记关系密切,都是张议潮十四女、李明振之妻张氏在李氏家族与张承奉权力斗争之中落败后,为超度亡子所抄的佛经功德记^①,所以本册残片出土地不能遽定,很可能混入了部分出自敦煌的文献。

存6行,首先录文如下:

1.] 膝端□
2.] 令此诸虫众□
3.] □处不至见此事
4.] 天子天女若眼
5.] □狱箭半多罗
6.] 应当谛观自身

我们比定这件残片为《治禅病秘要法》,译者是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其事迹见《出三藏记集》卷一四:

沮渠安阳侯者,其先天水临成县胡人,河西王蒙逊之从弟也……少时尝度流沙,到于阗国,于衢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师佛陀斯那,咨问道义。斯那本学大乘,天才秀出,诵半亿偈,明了禅法,故西方诸国号为人中师子。安阳从受《禅要秘密治病经》,因其胡本口诵通利。既而东归,于高昌郡求得观世音、弥勒二观经各一卷。及还河西,即译出《禅要》,转为汉文。

居数年,魏虏托跋焘伐凉州,安阳宗国殄灭,遂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务,常游止塔寺,以居士自毕……至孝建二年,竹园寺比丘尼慧濬闻其讽诵《禅经》,请令传写,安阳通习积久,临笔无滞,旬有七日,出为五卷。其年仍于钟山定林上寺续出《佛母泥洹经》一卷。^②

《梁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后亦附有沮渠京声传,文字略同。又《治禅病秘要法》有后序称:

河西王从弟优婆塞大沮渠安阳侯,于于阗国衢摩帝大寺金刚阿练若住处,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国中独步,口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籍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沮渠亲面禀受,忆诵无滞,以孝建二年九月八日,于竹园精舍书出此经,至其月二十五日讫。^③

据此可知《出三藏记集》所记沮渠京声孝建二年(455)所译“禅经”就是《治禅病秘要法》(或称《禅要秘密治病经》)。由此看来,沮渠京声曾两译《治禅病秘要法》。少时于于阗国佛陀斯那学得此经,返回河西后即将之译出。北凉于439年为北魏所灭之后,沮渠京声投奔刘宋。在战乱辗转之中,他在河西译出的佛经可能大半散失,至孝建二年才又应请,于建康竹园寺将《治禅病秘要法》

①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文献》1989年第3期,第87-100页。

②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551页。

③《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册,第342页。

重新译出,由于“通习积久”,仅十七日就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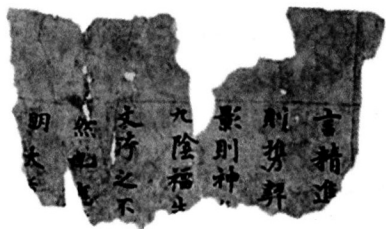
由于北凉统治者极重佛教^①,沮渠京声又身为王族成员,他于北凉统治末期在河西所译的《治禅病秘要法》初译本是否曾在河西地区流传,甚至随着沮渠氏西奔而被携至高昌,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出自新疆或河西的本件抄本也为我们思考该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不过由于《治禅病秘要法》初译本不传,我们无法了解两个译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有多大;并且本件抄本残留部分文字与大藏经本全同,因此稳妥起见,还是应当同时考虑这是沮渠京声在刘宋第二次译经北传的结果。南北朝时期,中原通西域的传统孔道河西走廊属于北朝势力范围,但通过益州与鄯善之间的“河南道”,南朝与西域依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联系,通过往来不绝的使节与求法僧侣,许多佛经也得以在两地之间流通^②。沮渠京声新译《治禅病秘要法》或许也是在此时传入高昌的。

三、道教典籍

5. SH.174-2-50+SH.174-2-58 《老子道德经序诀》

原件裂为两片,分别裱于《六朝写经残字册·二》叶八与叶一〇^③,可左右缀合,缀合后存7行。《中村集成》未定名。该册封面有题签“六朝写经残字出鄯善土峪沟仲父珍藏”^④。楷书精写,有乌丝栏。缀合后录文如下:

- 1.言精进[
- 2.则携契[
- 3.影则神□[
- 4.九阴福生[
- 5.文涛之不[
- 6.然也应[
- 7.明大道[



经比定,这件写本为《老子道德经序诀》,是以下段落的一部分:

余先师有言,精进研之,则声参太极;高上遥唱,诸天欢乐,则携契玄人;静思期真,则众妙感会;内观形影,则神炁长存;体治道德,则万神震伏。祸灭九阴,福生十方,安国宁家,孰能知乎?无为之文,污之不辱,饰之不荣,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自然也。应道而见,传告无穷,常者也。故知常

①小田义久:《沮渠氏と佛教》,《龙谷史坛》第60号,1968年,第1-55页。姚崇新:《北凉王族与高昌佛教》,《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68-77页。

②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195页。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4-14页。

③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100-101页。

④转引自锅岛稻子:《中村不折旧藏写经类收集品》,第359页。

曰明。大道何为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极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宝之焉。^①

《老子道德经序诀》包括《老子道德经序》与《太真隐诀》两部分，故合称《序诀》，历代著录多记作者为葛玄，敦煌出土抄本亦题为“太极左仙公葛玄造”，但实际上仅有全文第一部分或为葛玄所作，之后的内容则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多次附益而成的，全文成书大约在梁陈之际^②。此后《老子道德经序诀》既有一卷单行本，也作为序附于《道德经》前，敦煌文献中就存有两种形式。

本件写本之外，吐鲁番出土《老子道德经序诀》还有大谷 8111 号^③，由于都是较小残片，尚不能确定是单行本还是《道德经》起首部分。两件写本均由黄麻纸抄写，楷书精良，或为西州道观藏经。

6. SH.174-3-2《老子道德经》

存九行，下部残断，裱入《六朝经残纸册·三》中^④，《中村集成》未定名。《写经类文书目录》著录为“鄯善土峪沟出土”。楷书，有乌丝栏，抄写精美，应当是唐代写本。首先录文如下：

1.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
2.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
3. 精之至终日号而不嗟和之[
4.]□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日强□[
5. 道非道早已[
6.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
7. 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
8. 亲不可得疎不可得利不可[
9. 不可得贱故为天下贵[

本件抄本内容为《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第五十六章，每章之后不注明字数，其中第 8-9 行作：“〔故不可得〕亲，不可得疎；不可得利，不可〔得害；不可得贵，〕不可得贱；故为天下贵。”“得”字后无“而”字，与敦煌《老子》写本无注的五千文本属于一个系统。

《老子道德经》在吐鲁番发现亦属首次。贞观十四年（640）太宗灭麹氏高昌国后，在此设立西州，随着唐王朝对西州统治逐渐稳固，唐朝统治者所尊奉

①张太守编：《道德真经集注》，《道藏》第 13 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正统道藏》本，1988 年，第 1 页。

②福井康顺：《老子道德经序诀的形成》，《日本中国学会会报》第 11 期，1959 年。大渊忍尔：《老子道德经序诀的成立》（上），《东洋学报》第 42 卷第 1 号，1959 年，第 3-40 页；《老子道德经序诀的成立》（下），《东洋学报》第 42 卷第 2 号，1959 年，第 53-85 页。王卡：《〈老子道德经序诀〉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 年第 3 期，第 120 页。

③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叁，法藏馆，2003 年，第 240 页。

④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 102 页。

的道教也逐渐传入该地。荣新江先生《唐代西周的道教》一文指出:开元到大历年间,由于官方大力推动,西州迅速建立起数座道观,并形成包括观主、威仪、链师和道士在内的完善组织,此外西州道门领袖多为当地大族,显示出道教在此地的实力^①。道观的建立与道教组织形成的同时必定伴随着道教经典的充实,《老子道德经》作为道教根本经典在吐鲁番发现亦是意料之中。

7. SH.174-5-103《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

存5行,裱于《北凉写经残纸册·五》叶一六^②,《中村集成》未定名。出吐峪沟,有乌丝栏,楷书精写,卷面疏朗。首先录文如下:

- 1.]三揲香[
- 2.]主国王君[
- 3.]学门人隐[
- 4.]道归身归[
- 5.]命太上[

经比对,这件残片应当是《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此经在敦煌发现有六件抄本,即:P.2730、P.2442、P.2406+S.7956、P.2352、P.4658、S.6312+S.7730+P.2451,其中P.2406存首题《太上洞玄灵宝明真经科仪》。此残片内容为以下经文的一部分:

次又三揲香呪曰:臣今故烧香愿,以是功德为帝王国主、君臣吏民、受道法师、父母尊亲、同学门人、隐居山林学真诸道士贤者,愿各得其道,归身归神归命。大道臣等首体投地归命。太上三尊愿以是功德归流帝王国主、君臣吏民、受道法师、父母尊亲、同学门人、隐居山林学真诸道士贤者,愿各得其道,安居无为,长享福祚。^③

此经在《正统道藏》中收入正一部,但《道藏》本这一段文字与敦煌本和吐鲁番本差异颇多:起首“次又三揲香祝曰”,《道藏》本作“臣今故立直,二揲上香”;“帝主国王”,《道藏》本作“帝王国主”;“归身归神归命”,《道藏》本作“皈身皈神皈命”。又《无上秘要》卷五三《金箓高品》引《洞玄明真科经》也有这一段文字,除个别字外基本与吐鲁番本和敦煌本相同。可见《道藏》所收《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与其早期文本已存在一定差异。

8. SH.176-86《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

存6行,裱于《流沙碎金册》叶一五^④,《中村集成》未定名。出土地尚不能确定。

①荣新江:《唐代西周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7-144页。

②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113页。

③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43页。

④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126页。

周西波在《中村不折旧藏敦煌道经考述》已录出前5行文字,并将之比定为《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①,但是最后一行文字残缺过甚,他没有录文。我们在考察最后一行文字后,发现这件写本与今《道藏》本《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录出全部6行文字:

1. 兆已道合无[名数][
2. 匝兆体乃成和合[三][
3. 当须帝营天皇之功[
4. □神并神去则死神[
5. 之根太一为道之变九[
6.]之宅玄液为道之[

第6行《道藏》本原句为“九宫为道之宅,玄田为道之圃,玄液为道之津”。而本件写本并无“玄田为道之圃”一句。又检《无上秘要》卷五引《洞真太丹隐书》和《云笈七笺》卷四四《太一帝君太丹隐书》,亦无此句,可知《道藏》所收《洞真太一帝君太丹隐书洞真玄经》单行本在北宋之后尚有改易,这对我们了解这部道经早期面貌有所助益。

以上我们对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写经残片册”中的十件(缀合成八种)典籍类写本残片进行了比定和初步分析,其中既有中原传统典籍,也有佛教和道教文献。根据早期收藏者王树枏、梁玉书等人的题跋,这些写本残片多出自吐峪沟佛寺遗址。吐峪沟石窟寺始建于晋代,在高昌国时期和唐代名为丁谷寺,是高昌城或西州附近重要的大寺。这些年代自5世纪到10世纪间的写本,应当就是寺院收藏的典籍。它们保留了典籍较为原始的面貌,具有一定的文献校勘价值,同时也展示出中原与西域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

【作者简介】包晓悦,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专业方向:隋唐五代史。

^①周西波:《中村不折旧藏敦煌道经考述》,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敦煌学》第27辑,乐书局,2008年,第88-89页。